

我国聋校教科书的百年演进及内容取向

高宇翔^{1*} 买合甫来提·坎吉^{2**}

(1.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2. 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聋校教科书在我国教科书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本研究梳理与回顾了百年来我国聋校教科书的演进历程及其内容取向,提出:我国聋校教科书经历了《启哑初阶》阶段(1884—1948年)、十年制教科书阶段(1949—1966年)、八年制教科书阶段(1967—1993年)、全日制实验教科书阶段(1994—2015年)和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阶段(2016年至今)等五个发展时期;遵循“从工具性转向多元价值”的发展方向和“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推进我国聋校教科书内容迭代的逻辑线索。

关键词 聋校 教科书 特殊教育 历史

分类号 G762

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物质载体,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据。教科书的编写进程、内容特征、使用策略等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基于历史视角的教科书研究为透视社会文化、教育目的与课程理念的时代变迁提供了窗口,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学”提供了根基^[1]。我国聋人学校(以下简称“聋校”)专用教科书的研制、出版工作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第一所聋校创建之际,至今已经历了百余年,然而聋校教科书的演进历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聋校教科书在我国教科书的体系脉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此,本研究通过收集教科书实物,查阅有关文献,回顾和分析了我国聋校教科书的发展阶段及其内容取向。

本研究采用教科书的狭义概念,即特指“课本”,且研究聚焦讨论基础教育阶段的聋校教科书,诸如1980年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编印的扫盲教科书《聋人识字课本(试用本)》、19世纪80年代全国三项康复工作办公室编写的《学说话:聋幼儿听力语言训练教材试用本》以及2014年出版的《聋人高职教材·大学语文》等非基础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1 聋校教科书的演进历程

民国时期的聋校教科书以《启哑初阶》为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统编聋校教科书共有四套,其中三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根据五套教科书的出版和使用时期,可将百年来我国聋校教科书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

1.1 《启哑初阶》阶段(1884—1948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套聋校教科书是烟台启喑学馆的

创办人梅耐德女士(T. Mills)编写的《启哑初阶》^[2]。梅耐德1884年到华后即着手编写聋校教材,《启哑初阶》的雏形——391张的“分级教学卡片”于1899年编成,经过完善,一套6册《启哑初阶》最终于1907年在烟台墨林书馆正式出版^[3]。

《启哑初阶》合计359课,供二、三年级的聋生学习使用^[4]。每课2页,前页呈现一个对应鲁东方言基本语音的汉字,其四周印刷事物图片、赖恩手势、拉丁字母和贝利字母(visual speech),后页呈现由该字构成的词和句。教学时首先教学生“把贝利字学熟了,然后再念用贝利字所编的单字”,最后学习一些由这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5]。

烟台启喑学馆还举办师资讲习所传播聋教育方法,因而民国时期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的聋校沿循烟台启喑学馆的教学思想,使用《启哑初阶》作为教科书。后来,由于方言差异和各地聋校用于发音教学的手指字母不一致^[6],且《启哑初阶》涉及部分如“信耶稣不给偶像磕头”“从前神降洪水灭世人”等封建迷信和宗教内容,我国一些民间人士创办的聋校为了满足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启哑初阶》进行本土化改造,以汉字、标注汉语语音的符号、贝利字母及当地使用的手指字母作为基础内容,编写出一些地方性的聋校教科书,并通过“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等部门审定^[7]。目前所知的有1929年上海群学会聋哑学校编印的《聋哑教本》、1935年杭州吴山聋哑学校编印的《注音符号、算术数目符号手切教本》和江苏如皋盲哑学校编印的《注音符号聋哑手切指导》、1940年前后上海中华聋哑学校编印的《国语罗马字拼音式手语初阶看图识字》等。

* 高宇翔,博士研究生,一级教师,研究方向:特殊教育史、聋校课程与教学。E-mail: gyxiang@mail.bnu.edu.cn。

** 通讯作者:买合甫来提·坎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阅读障碍。E-mail: mkanji@163.com。

总体来说,从梅耐德编写的《启哑初阶》到我国聋教育工作者的自编教科书,聋校教科书经过了一段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探索和积累了聋人教学经验、为我国聋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早期人才。

1.2 十年制教科书阶段(1949—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聋教育由国家主办的基本原则^[8],逐步收回了原有民间人士和宗教机构举办的聋人学校。教育管理部门认为“帝国主义把聋教育作为欺骗、麻醉中国人民的工具,传统的聋校教科书内容要予以彻底肃清”^[9],因此停止了对《启哑初阶》等民国时期聋校教科书的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0年成立,根据“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该社从1951年开始编写普通学校中小学教科书^[10]。当年,时任社长、总编辑的叶圣陶先生表示“缺陷者之教育,目前尚不能多所顾及,但将来必当重视”^[11]。对此,教育部提出聋校“与普通学校相同的科目,暂时采用普通小学的教材;对于普通小学没有教科书的科目,则需要教师自己另编或选择教材”^[12]。

编写聋校教科书是推进新中国聋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1954年,教育部召开“改编聋哑学校低年级语文教材小型座谈会”,确定了“以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的最新成果教育聋哑儿童”等聋校教科书的基本编写原则^[13]。1956年,教育部《关于聋哑学校使用手势教学的班级的学制和教学计划的问题的指示》规定聋校学制在普通学校六年的基础上延长为十年,以便聋生毕业时能学完普校教科书内容、达到接近普通学校毕业生的水平^[14]。同年,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盲、聋哑教材编辑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开始编写新中国第一套聋校教科书。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新中国第一套统编的聋校教科书于1957年起陆续问世,涵盖语文、算术两门核心课程,因其适用于十年制聋人基础教育,被聋教育界称为“全国聋校十年制课本”^[15]。

基于“一年级是聋生掌握初步的语文知识时期,二至四年级是聋生识字和学习语法的时期,五至十年级是聋生掌握系统的语文知识时期”的聋教育观点^[16],语文教科书包含1964年出版、供一年级使用的《聋哑学校语文初步》;由洪雪立、沈家英等聋教育专家编写,1957年至1959年间陆续出版,供一至四年级使用的8册《聋哑学校识字课本》;由文以战、赵峥等语文教育专家编写,1958年至1960年间陆续出版,供五至十年级使用的12册《聋哑学校阅读课本》。《聋哑学校算术课本》则主要通过增删当时的普通学校算术教科书内容编写而成,编者为数学教育专家关敏卿等,1957年至1962年间出齐了一套12册^[17]。

上述教科书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审定,确定了聋校教科书在我国统编教科书体系中的成

员地位,这无疑保障了聋校教科书编写与出版的质量,奠基了聋教育的中国话语,为聋校教师“不知道该向学生们教些什么才对他们有用”的困惑^[18]提供了内容方案,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在聋生中的传播,使聋生“培养了共产主义人格,在建设祖国社会主义斗争中日益发挥潜力”^[19]。

受特殊时代条件的影响,1966年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断了工作^[20],全国聋校基本上停止了“全国聋校十年制课本”的使用^[21]。

1.3 八年制教科书阶段(1967—1993年)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各地聋校陆续调整为八年学制,在缺少全国统编教科书供应的情况下,部分省市尝试研制了供本地区使用的语文、数学试用教科书,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教科书实物来看,主要有《辽宁省聋哑学校试用课本》《吉林省聋哑学校试用课本》《上海市聋哑学校试用课本》《江苏省聋哑学校课本》等,形成了全国多套聋校教科书并行使用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快速变革的时期,中小学校的教科书内容也在频繁调整。上海市的聋教育基础较好,成立了专门的“聋哑教材编写组”,该编写组通过清理第一套试用教科书中的“流毒”、增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气象^[22],在1976年编写出第二套《上海市聋哑学校试用课本》。该教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春季学期开始使用,同年,教育部要求编写一套供全国使用的聋校八年制教科书。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尚在逐步恢复工作,因此教育部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上海市、北京市等地的聋教育工作者。

这一时期聋校教科书的编写被形容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23]。上海市“聋哑教材编写组”牵头研制,来自各地的十余所聋校教师反复研讨、修订^[24],由语文、数学、会话(含日常会话)等组成的第一套《聋哑学校课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起陆续出版,由语文(含语文初步、阅读、作文)、数学等组成的第二套《聋哑学校课本》及配套练习册、教学挂图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起陆续出版。北京第一聋人学校牵头研制体育、律动教科书,1981年、1986年的修订稿由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代为印发,1992年形成《聋校体育教学参考资料》《聋校律动教学参考资料》定稿,并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常识课程《聋哑学校课本》则由“山东聋哑学校常识课本编写组”编写,1987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过教育部的统筹指导和各地聋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个由语文、数学、体育、律动、常识等课程组成的聋校八年制教科书体系初步建成,并在全国各地推广使用,它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聋校教科书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为聋教育注入了新的

活力。

1989年,国家教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该文件对聋校教科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文件要求“把残疾少年儿童教育切实纳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轨道”,这造成原有的八年制聋校教科书日益不适应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特教教材工作由国家教委有关机构归口管理,负责组织教材的编写、审定,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出版、发行工作”,这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教委特殊教育处在“组织编写和审定教材”方面的责任^[25]。“制定聋校教学计划、编写聋校教材”也被写入1992年国家教委、中残联《全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工作“八五”实施方案》。随后,1993年《全日制聋校课程计划(试行)》发布,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要求,明确将聋校学制由八年改为九年。至此,八年制聋校教科书迎来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

1.4 全日制实验教科书阶段(1994—2015年)

面对开展聋人义务教育的实践需要,1994年国家教委委托、指导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研究、编写和出版一套供全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聋校使用的教科书,并将其命名为“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

与以往几套聋校教科书明显不同的是,“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组织专职、专业人员研究编写,参与的部门有政治室、小学语文室、小学数学室、生物自然室、物理室、化学室、地理室、美术室、体育室、音乐室、职业教育室,可谓倾全社会之力。相较而言,同一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盲人学校教科书主要由普通学校教科书转译形成,培智学校教科书主要由地方负责编写,聋校教科书的研制是最富挑战性的^[26]。从1995年至1999年底,思想品德与思想政治、语文(含写字)、数学、理科、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美工7门课程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以及体育、音乐、劳技3门课程的教师教学用书逐步出齐并投入使用^[26]。

“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套统编聋校教科书,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较为完整覆盖聋校基础教育阶段课程体系的统编专用教科书,它的出版和使用,为聋人义务教育的普及提供了物质支撑,直至今日,这套教科书中的部分年级分册仍在聋校教学中发挥作用。

1.5 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阶段(2016年至今)

随着我国聋人义务教育基本普及,质量提升成为聋教育发展的新议题,而“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在内容上已经难以满足聋校教学的需要。2016年《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发布,提出了聋校教学的新理念、新内容,推进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聋校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新的聋校教科书称为“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体现了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最新思想、聋教育的最新理念,编写过程广泛征询了专家、教师的意见并进行了调查研究,为聋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了规范、科学的内容框架^[28]。它质量精良,采用16开大开本、全彩色印刷,经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起始年级于2017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至2022年春季学期已出版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沟通与交往、美术、物理、化学、地理等8门课程的部分册次。

2 聋校教科书的内容取向

教科书内容取向指的是教科书编写者在内容选编过程中的倾向性。研究者通过对聋校教科书及有关政策文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百年来我国聋校教科书在内容取向上既有发生变化之处,也有保持不变的方面,其中前者突出表现为“从工具性转向多元价值”的发展方向,后者突出表现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一对“变与不变”成为推进我国聋校教科书内容历史迭代的一条逻辑线索。

2.1 从工具性转向多元价值

课程内容一般包含工具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教科书作为课程内容的物质载体,其工具性是指承载学科知识内容的特点,与之相对的则是思想性、人文性、价值性内容。对我国百年来各套聋校教科书的内容整理、分析认为,从偏重工具性转向对多元价值的关注是我国聋校教科书内容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

早期聋校教科书内容的工具性有以下表现。一是突出关注了语言教育的工具性内容。第一所聋校成立后,基于医学模式的内容取向长期主导我国的聋校教育工作。医学模式把聋人在听觉语言方面的损伤或功能缺失视为非正常的,认为这种损伤或缺失不仅是导致残疾的主要、甚至唯一原因,而且是医学治疗或矫正的对象。聋校的教育目的往往窄化为“教授聋哑子女能通语言文字”^[29],语言类学科的教学直接承担着发展聋人学生语言能力的任务,被看做是聋校最基础、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教学^[30]。聋教育界甚至认为,“世界的聋教育,几乎就是一部语言沟通与语文教育的发展史,聋教育者和聋教育研究者的工作重心是发展聋童的语言”^[31]。相应地,在我国聋校教科书发展的早期阶段,内容的工具性被赋予了突出地位,最初为聋生“量身打造”的《启哑初阶》等均被用于语言类课程、向聋生授受发音技巧,甚至《聋哑教本》《国语罗马字拼音式手语初阶看图识字》仅呈现了用于语言训练的课程知识,少有涉及思想教育的内容,以期着重发展聋生的听觉功能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补偿或矫治聋生听觉语言缺陷。

二是突出关注了课程内容的社会本位取向。社会

本位是工具性的另一表现,这一取向认为,课程内容及相应教科书内容的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教育应该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决定^[32]。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宗教人士在我国创建的聋校希冀打破旧社会“抱定哑巴决不能开口说话的成见”并进行宗教文化渗透^[33],因此早期聋校教科书培养聋生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在民众面前进行说话、写作甚至唱歌,以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吸引关注、募集资金以及宣传思想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聋校教科书则明显迎合了当时加快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例如,《聋哑学校算术课本》第十二册中选编的应用题多数涉及耕种、养殖、采矿、炼钢、制造等内容领域,主要培养聋生解决相关生产问题的能力;1977年上海“聋哑教材编写组”制定的《第三套聋哑语文教材编写设想》中提出,语文课程是知识教学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统一,教科书应当承载“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写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方面的,革命传统方面的,先进事迹方面的,为人民服务方面的等政治思想”,这些内容具有鲜明的社会本位意识形态,却没有充分关照聋生个性品质的全面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聋教育的进步,我国聋校教科书内容取向逐渐从工具性转向多元价值。一方面,从最初单一关注语言类课程的教科书,到20世纪50年代出版语数核心课程的教科书,再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覆盖全部课程的聋校教科书体系,表现了教科书面向的课程范围多元化;另一方面,教科书承载的价值性内容从以往对政治思想、劳动素养的关注扩展到对国家认同、道德品质、审美情趣、科学素养、思维能力、创新精神等多元价值的关注,《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还要求在部分课程的教科书编写过程中增加反映残疾人自强精神的内容。可见,聋校教科书中基于学生本位取向的内容逐渐丰富,这既有利于培养聋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有利于将培养聋生成为具有良好个性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

2.2 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聋校教科书是我国教科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设计具有与普通学校教科书的诸多相似之处和基本共同性,但它毕竟是为适应聋校教学使用而专门编写的,在某些方面也理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综观我国各版本聋校教科书,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是其内容选择的基本原则。

聋校教科书内容的一般性即“文本间性”,可界定为与普通学校教科书存在诸多类似之处和广泛的联系^[34]。以纵向的时间角度来说,聋校教科书内容取向的变迁与近代以来普通学校教科书一致,都在西方教

科书的引进、自编教科书的兴起、统编教科书的普及趋向^[35],经历了从西人主导、民间生长、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向官方主导、国家统编、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变^[36]。

从横向的比较角度来说,聋校语文、数学等学科的教科书内容往往是将同一时期普通学校教科书作为“蓝本”,二者具有相似的编写团队、知识结构、学科内容、装帧设计,指向相同的教育目的,这一原则贯穿1949年以后聋校教科书各版本的编写过程。以数学教科书为例:20世纪50年代的《聋哑学校算术课本》参考了普通学校数学教科书的体系和部分内容,并在其基础上编写而成;20世纪80年代的《聋哑学校数学课本》是根据普通学校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的;20世纪90年代的《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数学》是根据《全日制聋校课程计划(试行)》和普通学校义务教育数学教科书编写的^[37];现行《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也借鉴了普通学校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从而使聋生所接受的数学教育在内容和教育教学理念上与普通学校学生基本一致^[38]。

聋校教科书的特殊性,是指教科书编写者基于聋生的特殊学情,而在教科书内容上进行的特殊安排,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早在新中国确定聋校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时就指出,聋校教科书内容特殊性突出体现在“注意聋人生理上的特殊性,遵循量力性的原则,充分注意直观原则”^[39]。20世纪90年代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兼顾聋校教育的康复补偿功能”“适当降低教材难度”“注意增加教材的弹性”等体现聋教育特殊性的教科书编写原则^[40]。

“补偿原则”是聋校教科书内容的突出特色。《启哑初阶》等早期聋校教科书就是以语言康复补偿作为主要内容的,在后来形成的聋校教科书体系中,各册教科书均不同程度地渗透了语言康复、思维训练的内容,且出版有指向聋生缺陷补偿、潜能开发的“会话”“沟通与交往”等特殊课程的专用教科书。不仅如此,内容分析发现《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体现出对聋生“劳动赋能”的价值内涵,比普通学校部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更关心常见的服务劳动和生活劳动教育,借此培养聋生成为生活自理、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劳动者^[41],这是补偿原则的另一种表现。

“量力原则”表现为聋校教科书内容在普通学校教科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替换和降级使用,从而控制了内容难度,更重视知识的基础性。例如,现行普通学校部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第4册《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千人糕》《开满鲜花的小路》《画杨桃》《咏柳》,第5册《大青树下的小学》《总也倒不了的老屋》《搭船的鸟》《不懂就要问》《掌声》等文降级收录于《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的第8册。

聋校教科书内容的条理性也往往更强,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类课程,在例题演算、新旧知识的连接上都为聋生提供了支架。

“直观原则”即采用大量图片从而发挥聋生的直观形象思维优势,使其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例如,虽然早期的印刷条件相对有限,但第一套聋校教科书《启哑初阶》在“黄”等教学内容中使用了彩色插图。20世纪50年代《聋哑学校阅读课本》使用了彩色插页呈现国旗、国徽,而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聋哑学校语文课本》全套含有插图多达1114幅^[42],最新出版的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的插图数量更为丰富、插图形象更为生动。

“弹性原则”旨在增强教科书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情聋校教学的适用性。聋校教科书设置了更多选读、略读篇目,课后习题数量一般较普通学校教科书更大,从而有助于针对聋生学情提供选做、拓展练习。例如《大象的耳朵》一课,在《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安排有文章的朗读、词语的朗读、句子的朗读、写句子、结合文章思考问题、结合生活思考问题、想象并交流等6个不同层次的练习题,现行普通学校部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仅设计了朗读、结合生活思考问题、结合文章思考问题等3个不同层次的练习题。

聋校教科书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编写原则,既有助于借鉴普通学校丰富的教科书编写的经验与框架,为聋生提供系统、科学的知识体系,又能针对聋生的认知特点和特殊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合的课程内容,这是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客观要求。

3 对聋校教科书的展望

回顾百余年的成长历程,聋校教科书为我国聋教育的起步与发展、为我国聋教育权利的保障与实现、为聋人青少年的成长与成才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合当前的聋教育现状与聋校教科书的编印情况,本研究对我国聋校教科书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思考。

首先,完成聋校义务教育阶段各门课程的教科书编写、出版工作是当前的迫切任务。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自2017年问世至今,仍有多个年级的教科书未完成出版,针对这一状况,不同地方的聋校或采用“聋校新版教科书+普校部编教科书”,或采用“聋校新版教科书+聋校旧版教科书”进行教学的方式,抑或在部分年级整合使用多种教科书^[43]。这是应对当前全套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尚未出版完成的权宜之计,难以保障教科书使用的科学性、针对性,内容的时代性、系统性。因此,在确保内容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教科书的研究、编写、出版进度,尽快推出全套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在义务教育阶段聋教育中全面使用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开展教育教学,是

当前聋校教科书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

其次,聋校教科书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聋校实验教科书均用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高中阶段的聋教育主要使用普通学校教科书,但是普通学校高中教科书难度大、内容多,且难以衔接聋校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不能完全与高等院校聋人单招单招的考试需要匹配。在各地聋教育逐步向高中阶段延伸的背景下,为了便于教师教学和聋生学习,也需要研究、出版一套统编聋校高中教科书,从而在学段上丰富和完善聋校基础教育教科书体系。此外,目前聋校义务教育教科书主要包括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为了使这套教科书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还需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供全国聋校师生使用的配套练习册、测试卷,组织优秀教师开发教学案例录像、选文配套的手语诵读视频等立体化资源,这是在内容上对聋校教科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最后,教科书的有效使用依赖于对教科书的深入研究。与普通学校教科书相比,目前聋校教科书相关研究的数量与深度均较为薄弱,为了更好地揭示聋校教科书编写思路、内容逻辑、使用策略,发挥好聋校教科书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功能,需要加强对聋校教科书的静态内容分析与动态使用研究,并基于研究成果,开展面向聋校教师的教科书使用培训。同时还应进一步开展聋校教科书发展历程、聋校教科书编写理论的研究,深化对聋校课程理念与教学思想变迁的理解,传承我国聋教育的优秀经验,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国际视野的聋校教科书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石鸥. 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7, (5): 5-9
- 2 5 孙桂华, 刘秋芳. 中国第一所聋校: 烟台启喑. 济南: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7. 2, 137, 180
- 3 刘秋芳, 顾定倩. 我国手指字母演变及其设计思想的比较分析. 中国特殊教育, 2019, (7): 22-27
- 4 编委会. 聋教之声 1: 白头着意栽桃李, 戴目从事特殊教育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7. 152
- 6 高宇翔, 顾定倩. 中国手语的发展历史回顾. 当代语言学, 2013, (1): 94-100+126.
- 7 高宇翔. 无声世界: 中国聋人史略.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8. 199-205
- 8 16 19 洪雪立. 十年来聋教育事业的发展. 聋哑人工作通讯, 1959, (Z1): 9-12
- 9 顾明远, 张厚粲.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教育学、心理学.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270

- 10 24 38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392-483
- 11 商金林. 叶圣陶年谱长编第3卷.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139
- 12 顾定倩, 朴永馨, 刘艳红. 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549-1550
- 13 39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378
- 14 张仁贤. 中国教育教学改革实用全书.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6. 1336
-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北文史集粹: 教育、科技、医卫、体育.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436
- 17 40 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 人民教育出版社书目·教材卷(1950-1999).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294
- 18 汪镜渊. 聋哑教育工作中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 哑教通讯, 1952, (4): 1
- 20 佚名. 人教历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s://www.pep.com.cn/rjgl/rjls/dsj/1970/>, 2021-9-20
- 21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辽宁省普通教育年鉴(1949-1985). 大连: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255
- 22 上海市聋哑教材编写组. 上海市聋哑学校试用课本·语文. 上海: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6. 说明页
- 23 季佩玉, 顾爱玉. 四十年口语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论文选编. 上海: 上海市第四聋校, 1998. 46
- 25 朴永馨. 特殊教育.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295
- 26 37 全国特殊教育研究会. 聋校教学文萃.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72-74
- 2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0).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336
- 28 李晨. 国家通用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教材历史回顾与展望. 中国出版, 2020, (17): 36-40
- 29 佚名. 试办杭州聋哑学校招生. 通问报, 1914, (30): 1
- 30 雪湘明. 岭园默耕录: 特殊教育轶记.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52
- 31 张宁生. 听力残疾儿童心理与教育.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55
- 32 靳玉乐. 课程论.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209
- 33 何玉麟. 我国聋哑教育发展的传说. 瘠铎, 1938, (3): 1
- 34 石鸥. 弦颂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9. 30
- 35 石鸥, 刘学利. 跌宕的百年: 现代教科书发展回顾与展望.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 (3): 28-34
- 36 吴小鸥. 教科书, 本质特性何在? ——基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几点思考.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2): 62-68
- 41 高宇翔, 买合甫来提·坎吉. 聋校人教社新版语文教科书有关劳动教育内容的分析. 中国特殊教育, 2021, (2): 39-44
- 42 卢江. 《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数学》特色解析. 现代特殊教育, 2017, (15): 27-29
- 43 高宇翔, 买合甫来提·坎吉. 近30年我国聋校语文教科书研究述略. 现代特殊教育, 2021, (4): 8, 13+54

The Evolution and Content Orientation of Textbooks for Deaf Students in the Past 100 Years in China

GAO Yuxiang¹ Mahpiret KANJI²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2. College of Psych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Abstract Textbooks for deaf students have an indispensable position in China's textbook system. This study reviews the evolution and content orientation of textbooks for deaf student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China. The findings: Textbooks for deaf student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language textbooks (1884 - 1948), ten-year textbooks (1949 - 1966), eight-year textbooks (1967 - 1993), full-time experimental textbooks (1994 - 2015), and experimental textbook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16 - present), with the change from instrumental to multiple-value of the conte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s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Key words school for the deaf textbook special education history

(责任编辑: 杨希洁)